

贵阳饮用水源地污染严重水质堪忧

核心调查

本报记者 王鑫昕

贵州省贵阳市主要饮用水来自“两湖一库”，即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据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网站的介绍，“两湖一库”每天为120多万市民供应饮用水，占贵阳市城区用水量的60%，被称为贵阳市民的“三口水缸”。

然而，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在当地调查发现，其中一口“水缸”的水质安全状况令人担忧。

排污沟被苗圃掩盖

阿哈水库位于贵阳市小河区，距市中心约8公里。这个竣工于1960年的水库风景秀丽，从高处望去，整个库区宛若著名景区千岛湖。然而，美丽风景难以遮挡库区周边的污染问题。

在库区东北面的阿哈寨，水库边住着几十户人家，房子依山而建，往下数十米，就是水库的水位线。记者沿着公路边一条小路往下坡处走，绕到路边楼房的背后，一片生活垃圾跃然眼前。

灌木丛中，各种生活垃圾散落在地上，就连树梢上也挂着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尿不湿，甚至成袋的生活垃圾。楼房背后，记者看到了污水的出口。尽管当时没有排放污水，但从管口残留的水渍来看，这里曾经有污水流出。

视野范围内，阿哈水库的水位线已经逼近这片垃圾下方。

在几百米之外的另一条小路旁，一个简易的厕所散发着臭味，记者站在厕所旁，就能闻到坡下二三十米处的水库水位线。

类似的污染不只一处。环阿哈水库公路沿途，记者注意到，不少民居距离水库甚近，岸边还有养鸡场。在水库西南方的金竹镇金山路，记者在公路边看到，一条小沟正汩汩地往外排放污水，沟底呈现墨黑色，水

面不时泛起白色的泡沫。

记者沿着小沟行走，垃圾越来越多，牛奶盒、饮料瓶、食品包装袋，各种垃圾或漂浮在水面，或陷在黑色的淤泥中。中途随着其他沟渠汇入，沟面越来越宽，大约1公里外，经过一片长满水草的沼泽地，夹杂着垃圾的污水汇入了阿哈水库。

不过，这条排污沟被一片郁郁葱葱的苗圃掩盖，站在公路边看，很难发现这条暗沟。

记者实地踏访后发现，这些地方都属于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保护饮用水源”的警示牌随处可见。立有多处的“阿哈水库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禁止行为”标志牌明确写着：禁止堆放、填埋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

村民们没把警示牌当回事

除了可见的生活垃圾，在水源保护区内的违章建筑，也是水质安全的隐患。

记者驱车沿着环阿哈水库公路前行，进入金竹镇阿哈生态村，村口立着一块“阿

哈水库警示牌”，落款是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不过，村民们显然没有把这块警示牌当回事，在道路两旁随处可见正在修建中的民房，以两到三层的楼房居多。

根据《贵阳市阿哈水库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在阿哈水库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与供水设施和保护区无关的项目。

住在金竹镇的一位居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修建房子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的老板。修好房子后，他们用来自外出租。

在竹林村一处正在施工的2层楼房前，记者佯装租厂房，房东热情地带着记者进楼参观。

“这房子有合法手续吗？”记者问。

“现在还没有，但能办下来。”

“将来会不会像那栋房子一样，被政府推倒？”记者指着不远处的废墟，表达了忧虑。

“放心吧，不会的。”房东说。

4月5日，金黔在线网站的一则消息称，

贵阳市小河区阿哈水库水源保护区，随着43处违法建筑的顺利拆除，小河区竹林村的违法建筑拆除工作基本完成，拆除面积共计30000多平方米。

4月6日晚，记者电话联系竹林村上述房主。这位房主称，自己的房子前几天刚刚竣工，不过这次拆除违法建筑的行动对他没有影响。“拆的都是外地人盖的房子，外地人没有关系，所以房子被推倒。”

在库区东北部的阿哈寨，一处2层民房内，一名中年男子的回答更令人惊讶。

谈到污水排放问题时，中年男子提高了警惕：“排得多不多？几十吨的废水可不行，管得可严了。”

“不多，一天也就几吨吧。”假扮外地客商的那人说。

“那问题不大，自己处理就行了。”中年男子还帮着出主意：挖个池子，挖条暗沟，白天存着，晚上排放。

记者在多处暗访，房主或领头的工人均表示，如果租房用于办工厂，可帮忙落实

办厂的配套条件，比如牵引电压为380伏的工业用电。

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巡查

4月6日下午，本报记者联系上了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电话里听完中国青年报记者对阿哈水库生活垃圾污染和违章建筑问题的陈述后，办公室一位姓黄的主任说，这种现象应该不存在，她进而表示：你说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核实。

黄主任说，水源保护工作，有的属于两湖一库管理局的职责范围，有的属于地方政府管。至于哪些属于两湖一库管理局管，哪些属于地方政府管，黄主任没有明示。她说：我们是严格按照有关水源保护条例的规定来执法的。

黄主任强调：“在水源保护区内，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巡查。管理局也在水源保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今年启动了生活垃圾清理项目，在一些片区启动了污水处理项目。”

发稿前，记者在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官方网站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两湖一库周边村寨历史存量生活垃圾清理项目正式启动实施》。消息称，两湖一流流域范围每天产生生活垃圾上百吨。长期以来，由于生活垃圾管理机制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垃圾随意堆放在湖岸、沟渠、排水沟附近，雨季来临时，大部分垃圾随雨水冲刷进入湖库，给两湖一库水环境带来极大影响。

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与云岩区、小河区、花溪区、清镇市、金阳新区签订了《两湖一库周边村寨历史存量生活垃圾清理扶持协议》，全面开展两湖一库周边村寨历史存量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消息最后说：清理工作将于4月底完成，确保在雨季来临前彻底清除两湖一库周边村寨历史存量生活垃圾，防止大量垃圾被冲刷进入湖库。

核阴影下，日本志愿者捐助病重“慰安妇”

本报记者 庄庆鸿

这个春天，日本东部发生的大地震、大海啸和随之而来的核电站危机给全世界笼罩上了重重阴影。同样在这个春天，一群日本人穿过灾难的阴影赶来中国，只是为了为一位病重的中国大娘。

这位中国大娘，叫万爱花。

病房里的相见

在中国民间对日二战索赔的漫长战役中，“万爱花”是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她被称为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日军性暴力受害者”，遭受残害导致终生不育，1.65米的身高也变成了1.44米。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予以经济赔偿。

而找到她们、帮助她们站出来说话的，就是日本女土石田米子带领的“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她们从1996年开始，就在山西农村寻访日军侵华战争时期受害的中国“大娘”们，十数年如一日。

这次她们赶来中国，是由于知道了万爱花病重。病床上的万爱花托山西大学教授赵金贵给石田米子带话：“这次我也差不多要死了吧，我希望达成的事还没实现，死不瞑目啊，还是想要拿这把老骨头斗一斗。”

考虑经费及工作等问题，此次来的日本志愿者并不多，有9名，多数是50岁以上的人。

3月27日下午，太原街头阳光很烈，很难打车，而日本志愿者们又没有雇车，长年一直参与“慰安妇”诉讼的川口律师一直迎着大风挥臂打车。送走了好几辆车后，她在迈下人行道时，一脚踏在台阶边缘，直接正面朝下摔倒了，半天无法起身。好不容易被搀扶起来时，她皱着眉头，倒吸了好几口冷气。

虽然一瘸一拐，但她还是坚持和大家一起向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部走去。

在病床上24小时吸氧的万大娘看到日本志愿者进来，一下子抬起了手。

戴眼镜的小林女士率先俯身坐在病床边，双手握住了万大娘的手。她曾经在山西留学两年，在志愿者里经常担任翻译。病床上的万大娘向右边侧过头，无力地蠕动着嘴唇。记者也不能听懂老人孟县方言的低语，小林女士却能够翻译。

万大娘一开头问的是：“谢谢你们来，你们几时回去啊？”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日本志愿者轮流到病床前，握住了万大娘的手。

石田女士问起病情，万大娘抬起手伸出两个指头，反反复复说：“我要出院……不要治了……每天都花两三千，每天两三千……太贵了……”说着说着，浑浊的双眼渐有水光，说到最后摇了摇头，右眼一滴眼泪顺着面颊流进了枕头。日本女士中发出了低低的抽泣，有人掏出了手帕。

在这个过程中，小林女士一直保持着

笑容。听着听着，她伸手抚摸万大娘的头发。老人一直被染得很黑、很精神的头发，末端已经新生出了几寸的白发。

“以前我还到万大娘家，和她们一家人一起包饺子，以前她精神一直很好……”小林女士走出病房后才叹息说。

最后，在早稻田大学开设“女性之战争与和平纪念馆”的池田惠理子女士掏出了一个小袋：“我们有一位志愿者也正在日本住院，此次不能来了，她跟您问好，说要加油！这是大家送给您的‘幸福小猪’！”站在病床边的人终于都笑了起来，万大娘把粉红的毛绒小猪拿到眼前，也第一次笑了。

“太花钱了，不要治了”

石田米子回忆起来，2010年6月，万爱花大娘从床上不慎摔落，脸部受伤缝了六针。在9月与石田米子见面时，万大娘脸上还留着明显的伤痕，在笑着和她对话中起身去呕吐了很多次，“让人很是担心”。

万爱花的肠胃问题是老病，用她唯一的养女李拉弟的话就是“一年365天，能吐350天”。去年11月13日前后，万爱花就在家“突然吐了出来，还带血”。当时送到了山西省人民医院，“一星期就花1万元”的价钱很快就让一家人无法承受，转院之后住了两个月零三天。

今年这次发作是在3月7日。仅仅回家过完春节、吃了次饺子，万大娘在家休养后被送到太原市中医院，被抢救过来。3月17日再次休养后，被转到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住院。“那几天不敢动她，一动就吐，都是我女儿给她弄干净，现在没怎么吐了，也能自己翻身了。”李拉弟说。

“第二次休养前，还能每天吃点面条稀饭，而从那以后肚子就痛得不能吃饭，吃了就吐。”李拉弟说，至今为止，万大娘已经休养了5次，无法摄入水分，基本靠吊瓶维持营养。少的时候每天挂两三瓶，最多的一天挂了12个吊瓶，从白天一直挂到第二天凌晨3时，家人一直不能睡，看护着吊瓶里缓慢的一滴一滴，维持万大娘的生命。

说话间，李拉弟的二女儿拿出一个方形饭盒，泡了半盒从医院门口的小超市里买来的永和豆浆。“奶粉她喝不下，会吐，而且奶粉太贵了。”

万大娘慢慢侧过头，就着吸管喝了不到半分钟，就放下了。这样的“进食”一天有五六次，一共喝不到半盒。

“哪还能叫保姆啊？”李拉弟说，“我就是个老保姆，我女儿不让我陪床，怕搞出两个病来。”

陪床睡在哪？李拉弟的二女儿指了指靠墙的一张军绿色折叠床。她二十多天都没有洗过澡，前额的头发油油地结成一缕一缕：“今天星期几？几号？我都已经不知道了。”

据万大娘的主治医生介绍，目前可以确诊的是肠黏膜长期缺血缺血，但是万大娘拒绝了做胃镜、核磁等检查，因此进一步诊断一直无法做出。

李拉弟解释，不做检查一是因为缺钱，这几项检查分别要7000元、1000元不等。二是因为万大娘身体虚弱，“因为胃镜要从嘴巴里一直通下去，血管造影要从肚子这边开个口把管子通进去。我妈妈好长时间都没吃东西，身体很单薄，年纪又很大了，怕撑不住。而核磁要坚持40多分钟一动不动，这



日本志愿者在医院看望万大娘。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个我妈说坚持不了。”

“我们知道的是，我妈长期有胃病、冠心病，脚上有囊肿……”李拉弟说。

中年的护士长一边在万大娘瘦得皮包骨的手背上寻找血管，一边叹息说：“她的血管太脆了，一不小心或者是输液过程中一用力、动一下，针头都会穿出去，那就要重新扎针。”因此年轻护士不太敢给她打针。李拉弟数着：“27日三瓶吊瓶，左手打了4针，右手打了2针，一瓶输液80元……”

护士来巡视时，50毫升的输液还剩下20毫升，万大娘轻声说：“不想打了。”她时常这样回答护士和家人。

李拉弟回忆，万大娘住院以来心情“很不愉快”，一直在说“太花钱了，不要治了，我该死了……”

“慰安妇”的晚年

3月17日到20日是万大娘家人最困难的四天，每天的医药费达到3500元，一共花去9000元（最后一天没住满——记者注）。

而从3月20日至29日，万大娘的医药费又已花去1.6万元。与此相对，她仅有每个月310元的低保，以及作为共产党员一年1200元的生活补贴。

她66岁的女儿李拉弟没有正式工作，丈夫也已离婚多年。而李拉弟可依靠的只有三个女儿，老大是家庭妇女，“孩子太小不出来”；老二平时打点零工，现在日夜在医院陪护；甚至顾不上即将参加高考的两个女儿；老三在外打工，“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有时轮换来医院。短短20多天，一家人欠债近5万元。

“我算的钱都已经除去了国家医保负担的20%，我和女儿轮流管朋友借钱。”面色微黑、有高血压的李拉弟用力揉了揉眼睛。

据山西省的民间组织慰安妇问题研究会成员张双兵介绍，像万大娘这样的“慰安妇”受害者，如今都已是80岁左右，甚至不少人90岁以上，而且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生活保障堪忧。尤其是性暴力受害者中的很多人无法生育，这样在农村更苦。无人赡养、没有钱看病、营养不良等是普遍存在的情况，随着大娘们越来越衰老，其处境更是每况愈下。

80多岁的中国被掳日本劳工工会协会会长李良杰曾经去看望两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那个画面让他难以忘怀。

90多岁的那位大娘没有子女，又已经难以站立行走，从屋子里一路爬到院子里，要拖动柴火到屋里，另一位80多岁、当年被关在一起受害的“老姐妹”正好来了，才有人帮她拖柴火。

“这个80多岁的老姐妹当年被日本军抓去的时候才10多岁，有一天好几个日本兵要欺侮她，她生了病，已经在快要死了，另外这个年长一点的就站出来：‘她不行了，我替她吧，你们冲我来’……这样才救了她一命，所以她到现在还念这份恩情，时时来看望。”李良杰说。

石田米子她们找到的几位“慰安妇”受害证人中，王改荷、高银娥、赵润梅大娘已经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月的冬天

相继去世。山西省查明会也曾给予她们部分援助。张先兔、尹玉林大娘现在还住在农村窑洞里。

2009年11月开始，石田米子她们联合数个日本市民团体，在山西武乡八路军纪念馆筹备举办“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的罪行图片展”。

在她们努力下，16位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中国受害妇女的受害和斗争事迹，终于在她们的故乡展出。石田米子永远记得，开幕那天，满面皱纹的幸存者本人还有后代站在照片前，潸然泪下。

“我们的最初动因是在日本法院进行的‘慰安妇’、性暴力诉讼先后都败诉了，这再一次将斗争了许久的大娘们推向更强烈的愤怒和无比的绝望之中。所以我们希望她们的受害事实和苦难的人生、充满勇气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记忆，转告给更多的人，加深对她们斗争的敬意。”

在即将结束的展览中，有人留下了这样的留言：“看到展览又震惊又感动，向受害者大娘们表示敬意！”“万爱花大娘，我会永远支持你们。”

“60年前的罪恶，大娘们现在依然在痛苦中生存。看了觉得很心痛，大娘们请继续活下来！”

石田米子女士介绍，这一展览今年秋天将预计在陕西师范大学展出，“此外我们也在探讨能否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

“其实比起接受来自日本的援助，万大娘还是更愿意看到中国自家人的援助，还是更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更多的中国年轻人，知道她们的故事。”石田米子说。

穿过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阴影而来

石田米子女士带领的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志愿者团体，在这十几年中，每年要去孟县西部农村两次以上，倾听受害妇女的诉说，也加深和亲族的交流，“和她们分享活下去的力量”。

除了来自横滨的石田米子女士，其他8位志愿者都来自放射量迅速上升的东京。这使人不禁想问，连自己处境都需要担心的他们，究竟为什么还要在这时赶来中国，来看一位中国大娘？

“其实大家内心都很担心，也会有恐惧。在东京的所有人都遭遇了经常停电、交通停滞等种种困难，天天看放射量上升的新闻，信心也严重地被动摇，很害怕。但是万大娘是一直跟我们共同走过来的，她现在也在一直努力活着，也努力跟病痛战斗着。我们现在不能逃避，不能放弃一路共同走过来的人。”石田米子说。

“虽然害怕，但是我们无处可逃避。毕竟我们出生在日本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国家，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在这支多数人都超过50岁的队伍里算是“年轻人”的佐藤女士笑着说。

池田女士说：“主要是要保护下一代孩子们，对他们的食物的保护和过滤会严格一些吧。我们年纪大的人接受点辐射影响，得癌症的几率可能会升高，可能少活几年，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法学专家谈北京警方搜救驴友行动——

付费救援不可行

实习生 梅轶竹

本报记者 李丽

4月3日，39名驴友在北京市房山区四马沟猫耳山登山时被困，警方首次出动直升机搜救遇险驴友，调集300余人参与救援。

4月4日，17名登山爱好者在北京市门头沟龙门涧山中被困，警察、群众等290人参与救援行动，动用了3架直升机，历时21小时才成功救援出被困人员。

据了解，直升机用于警务，在发达国家比较早，美国1947年就拥有了警用直升机。目前，全世界有2500多架警用直升机在执行各种飞行警务。相比之下，我国警用直升机的使用才刚刚起步。1993年武汉市公安局在国内率先装备了警用直升机，广东、南京、郑州、天津、山西、北京等省市随后也建立了警务航空队。

尽管这不是警用直升机第一次出现在我国公众视野中，但相比空中巡逻和疏导交通，职能部门动用警用直升机搜救遇险驴友的行为，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据报道，在两次救援行动中，北京警方共出动警用直升机7架次，根据网友估算，警用直升机每小时飞行的燃油费就达2500元。

争论以此为焦点展开，一些网友提出，登山遇险是驴友的个人不当行为造成的，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为其埋单。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表示，救援遇险驴友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说法，不能成立。

王太元教授说，驴友本身也是纳税人，他们有权利享受社会公共资源。况且，生命的价值和金钱不能放在同一层面考量，在公民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社会职能部门有责任对其实施救援。

据了解，在警方的日常执勤中，警用直升机已经兼顾“民生”，主要负责巡逻防控、监测道路交通状况、监控火灾事故以及山地救援等三个方面。在这两次救援行动中，北京警方表示，直升机参与救援将不是特例，但要根据天气、地形地貌、被困者情况等多方条件，才会实施高空或其他方式的救援措施。

近年来，警方施救涉险驴友的事屡见不鲜。由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求被救者支付必要的施救费用，就能“迫使”这样的驴友“三思而后行”。

不过，王太元教授认为，救援职能部门是否应该设立付费救援制度，不能作为普适性问题一概而论。如果救援收取费用，那么，被救者可能会顾及经济问题而延迟报警求救，从而错失警方施救的黄金时间，酿成意外事故。

王太元表示，可以考虑让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被救者自愿通过慈善或者公益渠道支付一定的费用。但将付费救援作为一项制度的做法，目前在我国的可行性还很小。

“无论如何，警方都不能因为遇险者付不起救援费用而见死不救。”王太元表示，更何况，付费救援与警方救援原本所具有的公共服务性质不相符。

王太元指出，户外登山探险行为为切莫盲目冒险。由于目前我国户外救援体系尚不完善，一旦驴友在登山过程中发生危险，报警和救援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广大登山爱好者出行前要详细了解周边地理情况有所了解，随身携带GPS、急救药品等必要装备，临行前要告知亲友自己的去向，做到有准备出行，防止意外发生。

快救救我们的历史见证者

记者手记

庄庆鸿

83岁的万大娘一直在同被侮辱被损害的记忆作战，是勇敢。站出来做中国第一个“慰安妇”证人，和日本政府及右翼斗争，是勇敢！

日本志愿者们15年来每年去这个偏僻的农村记录这份历史，是勇敢。15年来向日本社会呼吁历史真相、应战右翼的威胁打击，是勇敢！

“勇敢”这个词，是对我在采访中所有震撼和记忆的概括。所有“勇敢”汇集

起来，是对“慰安妇”受害者大娘、日本志愿者群体的敬意。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期待看到中国同胞的身影。

在万爱花大娘这次恶化住院中，我知道关心慰安妇历史的张双兵老师已代付了1万元医药费，山西大学的赵金贵老师也全程提供了大量帮助，但是还没有听说其他的救助。而日本志愿者的“大娘医疗基金”也已经告罄，现在更是我们自己站出来的时候了。

如果日本志愿者在右翼打击的环境中都能这样勇敢，我们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能？众多“慰安妇”证人的晚年太令人担心，别让她们一步步孤苦贫困地凋零。

伸出我们的手来！